



我的生活

馮玉祥



我的 生活

馮玉祥



我 的 生 活

(下)

冯 玉 祥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 印张 9 14/16 · 插页 1 · 字数 236,000

1981 年 3 月第 1 版

198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30,000

统一书号: 10093·369

定价: 1.15 元

目 录

第二十六章	在常德(二).....	303
第二十七章	饥困线上	318
第二十八章	督陕	336
第二十九章	督豫	358
第三十章	穷困的陆军检阅使	370
第三十一章	首都革命	389
第三十二章	首都革命以后	416
第三十三章	赴俄途中	443
第三十四章	在莫斯科	461
第三十五章	五原誓师	481
第三十六章	平甘援陕	507
第三十七章	郑州会师前后	535
第三十八章	豫东大战	563
第三十九章	豫北大战	587
第四十章	完成北伐	599
附录一：	冯玉祥将军致李济深将军最后的一封信	610
附录二：	冯玉祥将军遇难经过	614

第二十六章 在常德(二)

我们刚到常德，即把常德的娼妓驱逐净尽。随后又和薛子良着手办理禁毒的事。那时统计，常德居民打吗啡针的占百分之五，许多年青力壮的小伙子，都以此变成肌肤溃烂奄奄待毙的废人。我看着这种现象，心痛难言。但一时又想不出有效的适当办法。乃和薛知事商量，请他先抓几个打吗啡针的人来验看验看，而后再想主意。第二天即抓来六名。吗啡真是可怕的毒品，凡打过一针，皮肤上即起一颗黑斑，接着就慢慢腐烂，不过半年工夫，即弄得体无完肤。这六个瘾客，已经遍体黑泡，溃烂得有如蜂窝一样了。他们原都是殷实人家子弟，因染此嗜好，而倾家荡产。此时已穷得日无三餐，夜无一宿，但吗啡针还是要打的。

我决定先成立一个戒烟所。所中请了医生，制办药品，连伙食也为他们预备得好好的，又派专人管理监视。瘾客除强迫而来者外，也有自愿来戒的。在初戒的几天，他们痛苦欲狂，但六七天过去，即渐平复，一个月即完全断瘾。那时原打算凡断瘾的人，即取保释放。但继而一想，他们出去后没有半点谋生的技能，仍不免流于下流，流为盗贼。于是我又仿照处理退伍士兵的办法，送他们到李显堂主办的工厂中去学习技艺。有学织布的，有学缝衣的，有学织袜的，都要学的技能十分成熟，确实可以养活自己，才让他们自由。这样一班接着一班地办下去，办到第七班上，戒绝的瘾客已达三四百人。

一天，一位老太太到镇守使署来见我。说他有两个儿子，都

打吗啡针，她早就要送他们来入所，但他们死也不肯。她不知如何方好，说着满眼含着泪。我安慰她说：“老太太你不要伤心。这事交把我，我一定替你办的好好的。”于是派人把他两个儿子抓来（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严厉训斥了一顿，送入戒烟所去。一个月后又送到工厂中习艺。只两个月的工夫，那兄弟俩已经养得大白大胖，又学会了一套好手艺。我把那老太太找来，欢欢喜喜地把他们领去了。戒烟所中的瘾客，像这样的最占多数。

至于贩运烟土的事，查办亦严。各地驻防部队，都指令严缉。因此常常大批大批的拿获。贩运者有种种狡猾的装运办法，有些藏在桐油篓的底层，外用洋铁封固，烟土都做成烙饼似的扁块，叠藏其中；有的甚至分带在裤子裆里。但真能漏网的还是少数。查得的烟土，都解常德，后积至数万两，乃约请当地的正绅及民众，在西门外空地上扫数焚毁。

我到常德，没看见街上有一个乞丐。初时还以为因地方富庶，贫人容易谋生的缘故。后来我打听，才知道商会办有一个平民习艺场。街上一发现乞丐，即由警察捉送场中习艺。所以此场亦名乞丐收容所。我听说有这样一个善举，心里极是高兴。一天，我到那里去参观，可是使我大大失望。里面有几架织布机和缝纫机，大半坏了，真能得着机子工作的占极少的少数。大多数的人——尤其老弱残废都关在一间潮湿黑暗的屋子里，无所事事。吃的食物过于粗劣不用说，而且多是腐臭了的。那种悲惨可怜的情形，简直不如猪狗。因此有许多逃跑的，逃出来了，再也不敢踏进常德的地界；逃不脱的，耐心等待着，死亡率惊人的高。这种情形我没法看得过去，禁不住对他们负责的人说，务要赶紧设法改善办法，改善设备，改善待遇，若是这样的办，是等于拿人家的性命来装点你们的所谓市容。哪里是办公益呢？我看还不如放他们出去自由行乞为好。这样说了一顿，才着手改良。我离开常德之后。

又不知情形如何了。

常德市上纸币极为紊乱，许多大商店出票，电厂亦发票，人们拿着种种不合法的纸票在街上买肉买布。我觉得这事应当整饬，遂与薛子良召集当地绅商商量办法，四个星期即整饬清楚。我所至之地，纸币之乱无过常德者。我们清理得很快，也妥当，人民都说办得好。

我又在街上建立石亭石柱，上面书刻曾文正公等的各种教人立身处世之道的格言。如教勤劳，教忠勇，教仁爱等，使街上颇有一种新气象。后来听说民国十九年时完全被人毁去，不知弄到哪里去了。石柱子二尺见方，石亭亦简单适用。很好的东西。忍意地去毁坏他，真是可惜。

常德城里的街道，经数次拨用罚款，翻修一新。那时我又开始注意到常德以外的数条交通要道。那些道路都太窄狭，太崎岖，平时不便行旅，一旦有事，更不便运输。但是经费无所出，抓工派款都是扰民的办法，决不能采用，乃动员我们的官兵任其事。并由邓鉴三、薛子良二位从县政府中设法，凡公路所经，占用之地，悉免粮税，凡被占过多者，必须给与地价。又和地方绅商一再磋商，决定先修由常德经临澧、澧县以迄津市的一条路，路面规定宽阔一丈二尺，做得平坦端直，如今日的公路。那时在湖南还没有公路，人民看见这样阔坦的道路，都喜欢不得了。

从常德至德山以东，那边有一座大石桥，年久失修，早已塌坏。这也是一条要道，行旅至感困苦。请人估计石料后，亦动员部队修筑，做得很坚牢，并不比石工做的逊色。

我与常德的父老正绅常常会谈，问问他们人民最感苦痛的是什么，最需要我出力帮助的是什么事。他们指出来，只要我能力所及的，无不尽力去办。一天我又和本地绅士蔡一陶、高晖庭两位先生问到这类话。他们才谈起每年初夏，山洪暴发，沿江水位高

涨，往往平岸，西南角城墙被水冲击，至为危险。若能把西南的城墙和城墙下面的石堤加以修筑，那真是造福地方的大事。但是就是这里工程太大，当地各界年年集议修筑，都以经费不敷，不能实行。我和他们说，我们可以出人工，只须派几位石工从旁指导，我们弟兄必能做的很好。高老先生等大喜过望，当即计划修筑。一直工作了两个多月，始告完工。后来我们离开常德不到一个月，常德即发大水，水濒城头，人们立在城堞上可以洗脚，但常德终未受灾，因此地方上格外感激。

此外饮水在常德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常德居民，大半都是吃江中的水，但每个埠头都是很骯髒的。如南门外的江岸边，一只挨一只地泊着民船，洗衣、洗菜、洗马桶、倒垃圾污秽，无不在此，而人们的饮水也在这里取用。中国临水城镇，都是这样，常德自非例外。这是最不卫生的事。我觉察此事之重要，故令部队在江边筑起码头，从岸上搭条板，凸达河中五六丈，远出污水范围，以便居民得以远离岸边汲取清水。又因江水涨落无定，乃派人专管其事，随时更张。这等事关系太大，而办理亦并不难。二十年后我因公再到常德，江边仍留旧迹，但条板已不如从前搭的长了。

我动员部队，在地方上作这种种的事，人民都口碑载道地表示感激。其实这本不算什么。人民出钱养兵，养官，兵和官替人民做些有益的事，还不是十分应该的么？为人民做工服役，士兵们无有不乐为的，问题是在官长有没有这番心，有没有这种朝气，这种精神，以为士兵表率。若是官长暮气沉沉，根本没有此心，那自然无事可做。到了今日，许多军队进步多了，但坏的军队仍是不少。那种能消极不害人民的，就算得很好的军队；至若积极地能实实在在为人民做事的，还是稀奇少有。其实人民是最有是非的，对他们稍有一点好处，他们就感激得久久不忘了。再说士

兵精力是愈练愈健旺，愈不用愈萎靡，若日久闲散，懒惰成性，那不只于人民国家为贻害，而且也毁了自己。

上面都是说的我在常德二年间对地方办事的大概情形。另一方面，对于部队的训练与整顿，也未尝一日懈怠。那时局面动荡，政治腐败，当轴握政者只一心对内，排除异己，扩张势力，谁也不肯正眼看一看民族的地位如何黯淡，国家的处境如何危急。我在常德住着，头脑是清醒的，认识是明白的。我时时感觉我们职责的艰巨，应当随时都有非常的准备。这不是容易的，我们必须真正能耐饥寒困苦，必需具有持久的战斗力量。要做到这个，又必须人人有强健的体格。因此我在常德训练部队的方针，首先即着重于体格的训练。

自从在廊房时成立军官体操团，此时更进一步编制成队。设种种奖惩的办法，从事严格训练。此外又扩大军佐队，凡在军中的人员，都一体参加，文职人员只有一位秘书长陈经绶（老拔贡）和一位军需官贾玉璋先生，因年老体衰，未令加入，此外没一个人可免。官军中只有受伤残废者得免，其余一体参加。军官队和军队都各佩银牌一块以为标识，由参谋处规定课目，军法处随时抽查考绩，每月一小考，三月一大考，年终一总考。军佐中有成绩优良者，得改入军官队，并令其统率队伍。他们初练时，很觉不便，日久即越练越有兴趣。那种书生气派的文职人员，不久即一个个变成粗壮的武夫，也能盘杠子，拿顶了，更好的也能在杠上打车轮了。后来每至军官会操，军佐中体操好的也选令加入。军官体操队日益扩大起来，终于军佐们全体加入，便成为军官军佐联合组成的“官佐体操团”。

各级官佐除一般的体操外，和士兵一样，也有跑栏阻等等项目。栏阻是用砖及土筑成，高八尺，厚二尺，一连八道，每道相距十五步。跑的时候，须一跃而上，跑过一道，又来第二道。练

到纯熟时，可以用手一按，身体就跳了过去，毫不费力。这类较激烈的课目，军佐们亦都有很好的成绩。

兵士们最常练的是荷枪行军，自官兵以至伙夫，一切必需的用品都要带上，每兵身上的荷重约四十八斤，不停地连走七天。那时最常走的路线，是由常德至临澧，由临澧至桃源，由桃源再返常德。初时日行八十里，渐增至每日一百二十里，一百四十里。经常的每月举行两次，风雨无阻。这不但磨练体力，亦所以磨练精神。使人人知道真正作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交通落后的国家，行军力的强弱关系于战果者至大至切。平时多一次练习，战时就多一分获胜的把握。

常德城头皆大砖铺砌，很是阔坦，可走四路纵队而有余。除远途行军外，每至大雨之日，即率士兵至城头绕着圈子练习行军。每绕一圈约有十里。城头上空气鲜洁，远望山河田原，景物至可怡神，故士兵们多乐为之。

为提高官兵们关于军事的知识与技能，特成立一个军事教导团，内分两队：一为军官教导队，一为军士教导团。由团、营、连队选拔稍通文理的军官及军士为学员。教导团以鹿鍾麟同志为团长，刘骥、门致中、刘郁芬、石敬亭分任教官。课目有战术、率兵术、地形、兵器、战史、筑城及典范令等项。最初规定三个月一班，预计一年另三个月后，全旅各级官兵即可分别训练完毕。后来提高课程标准，每期改三个月为六个月。到一九二四年，我驻兵南苑时仍继续举办，改为二年为一期，一直办到十六期。故国民军一般军官的教育程度，比起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并不落后多少。

我部队中的官兵，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贫苦家庭的子弟，自幼失学，一般知识程度严格的说都很不够。但怎样才算足够，这也没有标准。最要紧的还是要普通常识丰富，多识得常用之字，

故首先着重加强他们的阅读能力。这是我素来治军的注重点之一。在常德的期间，请陈秘书长和参谋刘骥编了一本军人读本，内选古今人的文章一百多篇。古文方面，多由《战国策》及《国语》之类书中选出，今文则为梁启超等名家的作品。这些文，按官兵程度之高下，分阶段讲授。教授方法，一是讲解，二是背诵。因为官兵们大半已过学龄，记忆力低减，若不背诵，则过目即忘，亦不易理解，且不足以增长其阅读能力。连长以上的军官，由我自己查考，背诵之后令其讲，回讲之后，再令默写。一次不熟，二次三次必须弄熟。规定五天读熟一篇，一月读熟六篇。每月一考：第一月考六篇，第二月考十二篇，以次递加。比这个较高的，有一汉文研究班，以便程度较高对国文有兴趣者选习，亦由陈经绶先生选文，集成义勇小史六十篇，皆史记中摘选出者，以为读本。程度较低者，除印发在浦口时所编的《战阵一补》令其熟读外，复新编军人教育一册，又编一本八百字课，以为从未识字的士兵伙夫的读本。

此外又成立一英文班和日文班，目的在帮助一般官佐了解译述的军事书籍，并进而直接阅读及翻译外国军事学名著。虽然进行很是迟缓，但选习者均有精神。

此外又设一工艺班，分木工、铁工、照像、修枪等数种。规定每个官佐，至少须习一种。先询各人愿习何种，而后分组请人教授。当时选习木工、铁工及修枪者居多，故成立大组。我自己学的是修枪，每日由下午一时至二时请刘正琳先生来教。受伤残废士兵，亦须学习一种技艺，体力不足者，至少亦须学习绘画或类似的轻巧工作。

那时的陆军规章，凡士兵从军三年，即当退伍。这个规章无人遵行，我在常德时试着筹办，即遇最严重最困难的问题，那就是退伍后的生活问题。因为自从帝国主义者的大炮打开中国门户

后，中国农村普遍破产，一般青年在乡村中无法谋生，方大量的投军入伍，以谋出路。他们家中既无可资温饱的恒产，本身又无足以自立的技能。一旦退伍，既无法生活，结果必迫得他只有利用其在军中所学得放枪瞄准的一套，而流为匪盗。原来中国的许多规章，都是从西洋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的。“三年退伍”的办法，在西洋那样的社会和征兵制度之下，是适合的，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募兵制度之下，即格格不入。然而政府只管官样文章地颁布条例，实施这些条例的实际情形，大人先生们就不去注意了。试思士兵们之投军，原多是为的救国，亦为解决生活问题的，若三年后又复挥之使去，不管其退伍后如何谋生，这种的办法，岂不是制造匪盗游民，破坏社会国家秩序的办法么？

为试办退伍，我采用寓兵于工的办法。我在军中成立一个小型的工厂，先在石友三主办的学兵营中试办，后补充基金为一万二千元，委韩多峰专办此事。又后，韩多峰升为机关枪营营长，不能兼顾，乃又委李忻为厂长。厂中分织袜、缝纫、织毛巾、编藤器及纸工五科，后来增设一印刷科。全旅目兵皆分班学习，在常德二年的工夫，即造就了几百个技术熟练的工人。后来我在信阳驻防，即见有许多退伍的旧部在那儿经营小本工艺，都能成家立业，自立自给。

我们治军的人，必须使士兵在军队时为保国卫民的好战士，退伍后为安分有用的好百姓。这句话看去容易，要真正做到，就当拿出精神来处处实干，方有效果。苟不然者，在军队时有害民扰国之兵，退伍后为游民匪寇，脱了军籍，即入匪籍，那真是贻国家人民以无穷之患了。

这期间，还举办有夏令会。因为官佐们整日操练，生活紧张劳苦，每年必使之有一变换环境的机会，能从休息中得到自修之益。夏令会办在城北梁山的庙中，四周都是浓密的树林，山水清

幽，地方凉爽而恬静。内设琴棋书画等娱乐消遣的物品，每天吃四顿饭，常请名人讲话，都是关于智体德群训育方面的讲演。全体官佐，分为两班，轮流换班，四星期一次，大家每年能有一、二个月的休假，都显得兴高采烈。我觉得这个夏令会，于全军精神有莫大裨益。

官兵们有暇，还练习泅水。因为我们在长江流域驻防，必须娴习此道，非徒增进健康，且所以获得技能，于作战时，遭遇意外时，都极有用。有一次，恰好一个英国朋友仁修本君，到常德传道，我们都知道他是个有名的泅水家。他年已六十余岁，曾在汉口泅水过江，把衣服脱下，拿在手中，游到江那面，再穿上衣服。他到了常德，我即请其在沅江表演泅水，以鼓舞官兵以及当地民众对于泅水的兴趣。沅江江面比汉口窄得多，他不费劲地泅了过去，又泅了回来，还觉得不过瘾。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来回泅过二里多长的江面，见者无不叹服。一个民族的强弱，于整个民族的每一分子都有关系。仁修本老先生这次表演，给与我们的官兵以莫大刺激。

我那时于公余之暇，还在本地的中学师范各校教课。教的是军事体操，如利用地物，目测打靶等。常由营中借真枪去，以为学生练习打靶之用。常常对学生们讲话，宣传救国雪耻的道理。说要救国雪耻，不是空口说白话所可办到的，必须把身体操练得十分强壮，必须有真正拿枪作战的本领。每星期教课数次，教者学者都很有兴趣。一九三八年我再到常德，曾看见那时上我的体操班的一位学生，他已经在当地当了小学校长了。

一日，我的副官长宋良仲从北京回来，和我见了面，就向我请假，说不干了。我问他什么缘故。他说不能干了。原来他从北京回来，经过彰德府，他的马弁遇见一位张敬尧部下的马弁，彼此相熟，说了几句。那马弁回来就向他辞职不干，说张敬尧部下

的马弁只干了二三年，就回家买了数顷地。人家是天天打牌，一夜的彩头就有几百元。而在我们这里，一文钱的外快都捞不着。宋良仲说：“你看，连一个勤务都用不住，怎么做人？”又说，他奉命到北京去办事，什么也办不通，领什么，没有什么。人家的副官都有数千数万的应酬费，和军需司、军械司以及总务司的官儿们终日花天酒地的应酬着。他们办公，就在窑子里，饭馆里，打牌，喝酒，躺烟灯，和人家打熟了，无话不可说，无事不可成。但他出差，却只有四十元的路费，到了北京，没处摸门路。“你看，这种情形，叫我办什么事？”

我只得安慰他一番，叫他不要着急。

他说：“您若能出些本钱，让我们把枪弹领来，怕不把这批混小子揍得干干净净！”

说的时候脸红耳热，气得嘴唇只打颤。我说，只要你办的到枪弹，我可以让你再去一趟。他说若能有一千五百元，他就可以有办法。我给了他八百元，他重新上北京，住了数月，果然把枪弹领来。第一次领枪二百支，子弹四十万；第二次领枪四百支，子弹一百万。军服甚至水壶亦均发下，是我们从未有过的事。那时在北京办事，就是这样的情形！

到了一九二〇年的春间，为北洋官僚军阀所操纵的中国政局，又起新的变化。自民国六、七年间，因为对南方护法军主和主战的意见不同，北洋军阀即有直派、皖派的分裂。其间，直派领袖冯国璋（冯死后，曹锟、吴佩孚、李纯等继为首领）虽曾一度对皖派屈服妥协，但毕竟裂痕宛然，实际言之，是直中有皖，皖中有直，直派、皖派的名目，本是南方护法军给分的，可是他们亦竟以此为号召。皖的两员大将徐又铮和靳云鹏，横行恣纵，不可一世。他们利用握有中枢的权势，作种种扩张自己势力，排除异己军队的活动。曾屡次向日本举行大借款，假借对德参战的名义招编所谓

参战军，由徐又铮、曲同丰统率。欧战告终，改参战军为边防军，另外又成立了西北军，由段自兼，而由陆军部部长靳云鹏代理。其实所谓边防军、西北军，统是扩张自己，统是要使之成为段家军。另一方面则尽力消减异己的部队，始则不按期发饷，继则将饷项由十足减至八成，再减而为六成、四成。越是认真训练，纪律良好的部队，越是不发饷，以使之消灭；而那种收容土匪，鱼肉百姓的部队，反到特别优待。这都显然有所用心的。此外还有明害暗杀的卑恶手段，凡稍碍他们眼的人，必除之而后甘心。如徐又铮之捕杀陆朗斋将军，并不免其职，亦不宣布其罪状，糊里糊涂即把他处死。这种种做法，狰狞猖狂，咄咄逼人，使直派将领显然感到只许他们胡作胡为，自己只有死路一条。

再有一件，也使直派不能忍受的：当护法之战时，皖派军队在湖南屡次惨败，时赖吴佩孚向南挺进，直打倒衡州。若论功行赏，湘督一席自应由吴佩孚任之，而段先生竟发表了张敬尧为湘督。这样的做法，显然是直派打仗，皖派做官。吴佩孚本人因大为不满，其他将领亦很抱不平。孙总理中山先生看透这一形势，故赠吴佩孚六十万毫洋。吴即撤兵北上，七月间即对皖派开仗。

直皖战争终于爆发了。这，一方面是使国家吃无穷之亏，人民受难忍之苦，一些训练较好的军队，不能以之对外为解放民族保卫国家的义战，即就此轻轻毁坏牺牲，一些有良心热血的好将领，陷在夹板缝中，痛心疾首，而又无法摆脱。但另一方面，亦不能不说是国家民族之福。这一批恶劣的军阀官僚们，若不这样的彼此残杀，自相消灭，国家将至何时始能上轨道？人民将至何时始得免于厄运？

直皖战争即在北方发生，南方军赵恒惕、谭延闿即率部进攻长沙，至此，无恶不作的湘督张敬尧始抱头逃窜。

张敬尧督湘二年多，真使三千万的湖南人民日处火热水深之

中。他用人的标准有三：一是本家，二是亲戚，三是同乡。所谓“二帅”、“三帅”、“舅帅”、“姨帅”之类，充满了督军署，布满了全湖南。湖南人有谚道：“会说霍邱话，就把洋刀挂。”实非夸张之词。这一批批的大小官吏，无廉无耻，无法无天，终日吃喝嫖赌抽大烟，恣意搜括以供淫乐。所统军队，比土匪还坏，对民众奸淫抢掠，无所不为，反正没有顾忌，没有约束。我在常德看着种种的乌烟瘴气，没法能够忍受，曾和吴佩孚左一电右一电地打给段先生，请他设法勒制，再不能任他胡作非为。可是我们越是说，却越使段先生怀恨，而张敬尧也越发恣纵。

张敬尧把湖南人民害得太苦太毒了，无人不对他咬牙切齿地痛恨。有的杀猪宰羊，以为劳军，等那些土匪官兵吃喝的醉了，人民就用菜刀、铁铲之类一一砍杀，往往一次杀死四、五人。害民的军队得此下场，实在是应该的！

张敬尧军退到岳州，沿途烧杀淫掠，当地人民畏之如虎狼，纷纷到教会中躲藏。张军知道，冲向那教会搜查。一位美国教士上前拦阻，乱兵即将此教士枪杀。这事传出去，激起美人愤慨，当派武力前来镇制。那美舰从上海起碇，以最大速力驰向岳州，显其威风，致在沿途江中冲翻了许多民船，许多无辜人民受灭顶之灾。这一方面是美舰不能处之镇静沉着之咎，但一方面也是张敬尧军所间接赐与人民者。这真是可耻可恨的事。看看人家军队保护他的人民是怎样的精神，但中国军队不但不能保护中国的人民，反倒欺凌之，虐杀之，而驱之托庇于外人，又将此外人一并杀之，而使江船中人民受此无妄之灾祸。这样的军人，还让他高高在上的当督军，是什么缘故？只因为他是老段的学生和同乡罢了。后来闹得不可收拾了，张敬尧托他的亲戚贾凯璋来央及我，请我通过教会关系，去和美舰说话。我说：“这没有话可说，你打死了人，只好你姓张的拿命去抵！”

赵、谭先头部队到达长沙的时候，我接到代理国务总理萨镇冰先生的一个电报，电中对我治军及为政很是夸奖，他说他已自动地致电孙中山先生，请南方军不要与我冲突，孙已复电表示同意。并把原电转给我看，叫我只管安驻常德，不必移动。我那时同萨先生并无一面之雅，竟蒙他这样热心关顾，使我欣慰极了。

赵、谭的部队当时虽然没有向我进攻，但我却不能不有所准备。因留少数在常德，其余都布置出去。南军在距离我们防地百多里的地方监视着，各不相犯。一日，驻汉寿的冯治安报告，说该方面南军进迫，离他防地仅只四十五里，仍继续前进，恐有决裂之势。那时冯为连长，那一面防地只他一连人，我颇不放心。因令团长鹿鍾麟带着一百多名手枪队，夜间开了去，天明又转回常德，天天如此，以防万一。有一天南军致函冯治安，说他们开来三、四营人，请即让开防地，以免杀伐。冯不肯屈服，回信说，我奉令在此布防，在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之前，决不擅离防地。南军又来信说：“我们有三四营之众，你一连人恐难阻止我们前进。”冯覆信云：“在我们一连人未死完以前，你们休想前进一步。”冯治安答覆如此强硬，南军因即停驻，终于未敢进逼。

不久，北京政府给我命令，叫我们队伍移驻湖北。我接到命令，决定仍走二年前到常德来的旧路，先到津市。那时在津市的驻军为王汝勤的第八师。我乃先发一电，将我奉令移驻湖北，取道津市的话通知他。哪知我的秘书长陈经绶先生一时疏忽，竟将此电译作明码发出。王汝勤接到我的电报，很是诧异，以为军队行动，当如何机密，怎么不用密码，倒用明码。因此判断我一定不会真的走津市，并来电问此真相。陈先生发觉此事，难过的不得了，连说“该死！该死！”立刻向我引咎辞职。我知道他是一时疏忽，不是有心之过，百般安慰他。我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